



累 苦行与救世

张永义 著



百家学术与中国心态文丛

累苦行与救世

张永义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特约编辑:冯 巽
责任编辑:余小华
封面设计:迪 赛

墨
— 苦行与救世
张永义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韶关市金启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厂址:韶关市陵南路8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03,000字
1996年8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6,001—11,050册
ISBN 7-218-02107-7/B·46

定价:1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李锦全

先秦诸子学术，儒、道、墨、法称为四大家。秦汉以后，有种说法：儒、道存而墨、法废。从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汉代经学与宋明清理学，都表现出儒学的独尊地位。道家后来衍生出道教，魏晋玄学则以道统儒，以自然整合名教。唐代三教并行，道与儒、佛可以分庭抗礼。宋儒吸取道、佛思辨，完成儒学的哲理化过程。迄今国内学术界，仍有对中国传统学术，儒、道谁为主干的争论，故儒、道存当属不成问题。至于法家，由于后世多认为秦朝用法而速亡，这是对申韩之术的片面理解。汉代以“霸王道杂之”作为基本国策，所谓“阳儒阴法”、“儒表法里”，成为历代所遵循的统治方术。因之，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儒道互补、儒法互补，是有以不同形式出现的。

但墨家思想的历史命运似与以上三家不同。战国前期，孟子阐扬、墨，斥之为无君、无父的禽兽，却不能否认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墨，可见其在社会上的影

响。战国末年的韩非，仍称儒、墨学显学。而于墨学的衰微，后人似乎未说清楚。从文献记载，《盐铁论》中有说：“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祸废古术，隳旧礼，专任刑法，而儒墨既丧焉”（《论诽》）。近人孙诒让据此说：“墨氏之学亡于秦季，故墨子遗事，在西汉已莫得其详”。但《盐铁论》另处又说：“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晁错》）。今传《淮南王书》对墨子颇尚推崇，当有墨者集论其间，表明墨学尚未中绝。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亦说道“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但此处并未为墨子立传，仅在孟荀传后附著 24 字。故墨氏之学虽非亡于秦季，而墨子遗事，在西汉时已莫得其详，当是事实，而墨学可能在董氏建议尊儒后逐步走向衰微。

西汉以后，墨家不但传人中断，而且连整理和研究墨家著作的也几成绝响。比《吕氏春秋》所记，称其“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当染》）自属不可同日而语了。据近来学者考察，称自汉武以迄清初千七百余年，漫漫长夜，略治墨氏之学而可考者，仅晋之鲁胜与唐之乐台二人而已。然鲁胜所著《墨辩注》久已失传，各类文献亦未见征引，仅存其《叙》言，称“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对自身工作，则谓“略解指归，以俟君子，其或兴微继绝者，亦有乐乎此也”（《晋书·隐逸传》）。晋在汉后时代距离并不远，鲁胜已提出兴微继绝问题，可见墨学所受冷遇。至于乐台注《墨

子》，郑樵《通志·艺文略》虽有著录，但不见于新旧《唐书》，则其存在实属疑似之间也。此外韩愈写有读墨子的文字，在当时也属罕见。宋明时期，更是寂寂无闻，可能视之为无父无君的异端邪说了。

墨学直到清代中朝才现转机，不过这并非墨家思想在社会上的复活，只能说是研究墨学的复兴。从乾、嘉到道光初年，有张惠言、卢文弨、孙星衍、毕沅、汪中、王念孙、丁杰、许宗彦、翁方纲等人。汪中由于不同意孟子对墨子的批评，认为“彼（指墨子）且以兼爱教天下之为人子者，使以孝其亲，而谓之‘无父’，斯已枉矣”，并指称“孟子之诬墨子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墨子序》）。汪中为墨子辩诬，被翁方纲斥为“名教之罪人，又无疑也”（《书墨子》）。由此可见，在专制时代研究学术之不易。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墨学研究成为一大热门，方授楚在《墨学源流》一书中，列有近世墨学书目六十多种，除那些对原著进行注释考订的著作，作出显著的成绩外，对于墨子生平及其学说加以研究或评论的论著，看来并不尽如人意，问题并不在于有各种意见分歧，而是有的学说所下结论过于轻率，亦有的有将古人思想现代化之嫌，还有的任意夸大、随意褒贬，成为主观武断的产物。著名学者如梁启超，他在维新未成避地日本时，写有《子墨子学说》，他在《叙论》中称“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惟墨学”。他先是批评孟子诋毁墨氏“兼爱”之言，后又说“孟子‘兼爱无父’之断案不断虐矣”。这样前后矛盾而为方授楚所讥。又如对墨学中斷問

题，李季为批评胡适，将墨家说成是革命派，认为刘邦是地主阶级掌握政权，陈涉、吴广革命失败，代表农工阶级利益的“墨学不能幸存，自是意料中的事”。而郭沫若则与此意见相反，说墨子“这一派在当时完全是反革命派，结果他是敌不过进化的攻势”，还说“这正是社会的进展取辩证式的证明”。其实无论说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只是主观推断，这些帽子是不能随便戴在古人头上的。至于对墨子本人的议论，也有各种新说，如墨子是否姓墨？是中国还是外国人，有说是印度人，初说是佛教徒，又有说是婆罗门教徒，还有疑称是阿拉伯人，等等。对这类问题引起的辩论就不多引了。

上面我引述这些资料，只想说明今天要想全面研究墨学仍属不易，这些年来，由于发表那么多论著，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有利条件，可以吸取前贤之所长；但要形成自家体系，还当断以己意。张永义这部《墨——苦行与救世》，我认为优点就在于“平实”二字，虽无石破天惊之论，但论证中能做到有理有据，一步一个脚印来说明问题。书中层次分明，文字流畅，具有可读性。为帮助读者了解书中的内容，这里我做一简单介绍，以供参考。

在该书的导言里，作者曾指出他的目的是“重建思想史中的墨家形象”，所以探求墨学产生、发展、衰微、复兴的经过和原因便构成了全书的基本内容。为了完整地把握墨学演变的历史，该书的论述分三编进行。第一编主要讨论墨子的思想与学说。按照作者的看法，墨子是战国时期最先提出一套系统学说的思想家。他的兼爱和尚贤主张批判的矛头直接

指向了传统的血缘宗法制度，是当时要求重建社会伦理的最有代表性的呼声；他的尚同、非攻和节用诸论反映了普通民众对统一、和平和富足的美好愿望；他的尊天、右鬼、非命说从内外两个方面替个人的行为制订了一至善的标准；他对谈辩之作用的强调则拉开了学派间相互辩诘的序幕。所有这些都使墨子的思想和行动呈现出许多其他思想家所不具备的异彩，如刻苦勤劳、一心向义、热爱和平、关心民众疾苦、重视经验和方法、尊重知识和能力等，这些异彩对战国中后期的思想界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第二编讨论作为一个学派的墨家。作者认为，墨家从产生到衰微大致持续了两百余年，这两百年可以粗略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墨家在墨子精神的感召下，比较偏重于行动和实践；后期墨家因受其他各家特别是名家和道家的刺激，则比较偏重于理论和辩说。墨家从前期到后期发生了一种从政治伦理向逻辑和科学的转向，这种转向使得后期墨家建构了一初步的逻辑系统，获得了许多科学发现，从而对中国古代科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三编主要讨论墨学的衰微、影响以及近代复兴的原因。作者指出，历史上对墨学衰微原因的分析虽多，但都没有把墨家不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存在和不能作为一种知识系统存在这两个问题分开。实际上，前期墨家的政治主张已被消解，后期墨家的学说无法承担意识形态功能是墨学不受秦汉统治者青睐的主要原因；而与中国文化基本价值取向有较大的偏差及遭遇儒家长时期刻意的压制则是使墨学甚至不能作为一

种知识系统存在的主要理由。关于墨学的影响，近人出于爱墨之心，多有夸张，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辨析，作者认为，秦汉之际并没有什么“儒墨合流”运动，游侠不是墨者，早期道教中也没有一派出于墨家，神仙化的墨子只是道士们的伪托而已，甚至近代墨学的复兴也不是墨家思想的真正复活，而是近代知识分子面对两种文明的冲突时进退失据的一种表征。所以，严格说来，墨家对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并未有多少值得人们注意的影响。

以上提要，仅是撮述全书大意，读者如能通读全文，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使墨学研究得到提高，是所企望。

导 言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恐怕再也没有比墨家的命运更为奇特的了。据《庄子》、《韩非子》等可靠文献证明，墨家是由墨子所开创、由其弟子和后学所推进发扬、有自己严密的组织系统、终战国之世均居思想界中心并足以和儒家分庭抗礼的“显学”。但曾几何时，这一著名的“显学”就迅速消沉了。到司马迁做《史记》时，有关墨家的材料是如此的缺乏，以至于太史公只能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末尾加上一个 24 字的附注来介绍一代大哲墨子：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对司马迁的这种做法，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指责这是太史公的缺失，有人则怀疑《史记》本有《墨子列传》，只是后来被崇儒的人删掉了。但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这都表明了墨学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就不可避免地衰微了。从此，不但墨家的思想和主张成了正统儒生们心血来潮时随意攻击的

对象，就连墨子的生卒年代、里籍姓名等也都成为问题，一代墨学竟顿成绝学！后来之治墨者，可谓绝无仅有，从汉武帝到清初一千七百年间，可考者仅晋之鲁胜、唐之乐台数人而已，但就连他们的注也都很快地亡佚了。

本来，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学派的兴衰只是一件十分平常的现象，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而理论往往正是借助于这种学派的兴衰替换才获得深化和发展的。这一点从东西方都可以找到大量的证据。诸子百家不必论矣，在古希腊，像米利都学派、爱利亚学派和智者学派等等又何尝不是如此，它们都曾经从显学的地位退却下来并逐渐消失掉。（相反，那种一直持续数千年而不变的学派看上去反而有点不正常了，它们往往必须依附于某种现实的政治势力并承担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然后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但墨学不同，仅从思想史的角度解释其兴衰变化根本不够。它的产生是那样的突兀，我们几乎无法获得其思想背景方面的任何确切来源；它的消亡又是那样地快捷，以至于人们常常疑惑墨家对后来的思想和社会发展是否曾经有过任何影响。显然，这已经不仅仅关乎一个学派的命运，它甚至同时关联到整个思想的演进、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发展等许多复杂的问题。对有些学派的兴衰，我们也许只用一句理智的觉醒和进步就可以简单的给予说明，但对墨学，任何仓促的回答都未免显得有点武断。

作为战国时期盛极一时的显学，墨家有许多重要的特征值得注意：1. 首开学派辩诘之风。人们常用“百家争鸣”来概括战国时期思想发展的特征，而最早挑起争鸣的正是墨家。

2. 最看重思想和辩论的方法。在先秦诸子中，墨子是最早意识到方法之作用的人，他所创立的三表法是对中国哲学的最伟大贡献。墨家后学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些逻辑原理并获得了许多科学发现。3. 具有明显的学派意识和严格的组织结构。墨家的巨子制有严格的传承线索、有坚定的组织纪律，同时也有自己独立的主张和社会理想。这样有组织、有纪律、有主张和目标的学派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象类似的特征我们还可以再罗列一些，但以上几点就足以使人疑窦丛生：既然是墨家首开学派辩诘之风，那么在此后两百年间的“哲学突破”中，我们究竟应该赋予墨家以多大的重要性呢？换句话说，在百家争鸣之中，诸子的理论和主张究竟打上了多少墨家的烙印？既然墨家最看重思想和论辩的方法，那么它是否和后来的名家有什么学派上的传承关系？既然墨家组织严格、学派意识极强，那么它又如何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历史上消失了呢？秦汉以后中国民间社会流行的一些宗教和帮派组织是否曾经受到过墨家的启发？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对于我们把握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脉络、了解中国文化的特征都是十分重要的。不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就很难公正地还原出中国古代思想演进的实际历史来。

好在对这些问题，前人已经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自清朝中叶以后，考据学大兴，儒生们为了通经解义而旁及诸子，《墨子》书中因包含许多《诗》《书》的内容而首次得到系统的整理。道咸年间，西学东来，外侮日逼，《墨子》书更因其中包含有光重几何之学而备受青睐，成为保守主义者对

抗西学的工具。维新变法之后，西学的影响既深，专制制度、宗法伦理的合理性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于是一向被视为异端的墨子兼爱之教反而成为沟通西方近代平等、博爱学说的津梁，墨子本人摩顶放踵、舍身救世的精神和行为也成为激励革命者英勇献身的榜样。与此同时，人们意外地发现，《墨子》书中的那几篇奇文（即《墨辩》六篇）还包含着相当丰富的逻辑思想，足以和西方古典逻辑学相发明，这对于那些一直相信方法万能的近代知识分子来说，更不啻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而且还是培养他们民族自尊和信心的绝对材料。于是，一时间，沉埋千古的墨学几乎重新成为学界讨论的中心，各种各样的研究、评论和宣传文字竞相问世。流风所及，直到本世纪30年代，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量的注墨、释墨和论墨的著作，以至于连善变的梁启超也充满信心地预言道：“盖最近数年间，《墨经》诸篇为研究墨学之中心，附庸蔚成大国，不久恐此诸篇将发挥无余蕴，墨学全部复活了。”^①

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讹夺之文得到删改，错落之简得到订正，诘屈难晓的文字得到疏理，《墨子》书变得大体可读了。墨家的思想和学说也得到条理和发挥，它和其他各家之间的关系、它兴起和衰亡的原因等问题重新勾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这为后人更进一步认识墨家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过，由于这种整理和研究工作发生在西

^①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6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学东渐的背景下，人们在思想上难免会受到这种时代思潮的影响，所以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常常带有中西文化冲突的痕迹：他们研究和推崇墨子或是为了抵御和应付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或是为了替这种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张目；或是为了在心理上满足“中国文化优越论”的虚荣感，或是为了从“事实”上论证西方文化对于全人类来说具有普遍的永恒的价值。在这种实用主义心态支配下，墨学研究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偏颇，各种各样比附缘饰之辞、模糊影响之谈铺天盖地而来，以至于许多本来十分清楚的问题也都变得游移不定了。譬如，有的人为了大张墨军，不惜打破学派之间的基本界限，把名家、农家的一些代表人物以及游侠等都延揽到墨家的名下；有的人为了重新鼓动墨家的精神，竟替墨子穿上了各种各样的现代服饰如劳工党领袖、雇佣军头目等；更有甚者，一些人震惊于墨学的成就和思想方法之独特，就凭借几条极不充分的材料，断定墨子不是中国人，而是什么印度佛教徒、印度婆罗门教徒、阿拉伯回教徒或犹太教徒。其他象为了迎合己见而动辄更改《墨子》书中文字的现象更是举不胜举了。对此，陈寅恪早在 30 年代就曾经痛心地说：“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

者也。”^①

这种状况到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有所改观，一些热衷于墨学研究的学者开始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重新探讨墨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这对于正确了解和评价墨子和他的学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就连他们也仍然没有摆脱中西文化冲突所导致的情绪化对峙的感染，象理想与现实不分、历史事实和价值判断混同的现象在墨学研究中依然存在。从50年代出版的一部颇有影响的论述墨家逻辑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读到这样的一段话：

我们知道，逻辑本身不但没有阶级性，并且是全人类的、是一切时代的一切民族都有的，一切发展阶段上全人类都有的。在二千几百年前，中国、印度、希腊的学术都有巨大的成功。所以在印度，足目建立了因明；在希腊，亚里士多德建立了逻辑。在中国，竟没有人能创立一门逻辑科学吗？道理上讲不通，事实上也不会有。据我们粗浅研究的结果，建立中国形式逻辑者是墨子。^②

从印度有因明希腊有逻辑，凭什么就能够推得中国一定会有逻辑？如果说逻辑是一切时代、一切民族都有的，那么人们

①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② 詹剑峰：《墨家的形式逻辑》第3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又何以说是足目建立了因明、是亚里士多德建立了逻辑呢？为什么没有人提出玛雅的逻辑、埃及的逻辑这样的说法呢？显然，在这里，该书的作者混淆了逻辑和逻辑学。逻辑所指的只是一些推理规则，逻辑学则是研究这些规则的科学。人的思维合乎逻辑规则是一回事儿，意识到这些规则并进而专门研究它，则是另一回事儿。这位作者之所以混同这两者，究其原因，在于他心中始终横亘着一条中西文化冲突的鸿沟，他不能忍受西方有逻辑学而中国却没有，这将会失去激发人们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工具^①，所以他仅从一些极不可靠的前提就推得了中国“应当”有逻辑学。这种心态，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是包括墨学在内的许多学术研究的典型特征。我并不反对说墨家有逻辑学，但这是一个历史事实问题，它需要建立在严格的经验证实的基础上，不能够仅从“应当”来推出。其实，“应当”是一个规范问题，属于伦理学的范围，正如同从“是”推不出“应为”一样，我们也决不能仅从“应当”就推导出事实来。在墨学研究中，不从这种好恶及情绪化对峙中解放出来，就别指望公正地对待它的地位和价值。

50年代以后，墨学的研究进入相对沉寂阶段，近年来的文化热潮也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人们津津乐道于儒释道三教的典范意义及现代价值，可对在传统文化形成中起了相当重要作用的墨学却熟视无睹。即使那些少数讨论墨学的

^① 詹剑峰：《墨家的形式逻辑》第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文章，也仍然没有摆脱过去的窠臼。譬如有人解释说墨家之所以衰亡是由于它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格格不入，但他们却忘记了墨学完全是一种“土生”的学说；有人认为墨学衰亡的主因是由于和儒家的实用理性不符，但这种说法给人的印象更象是倒果为因。结果是，在墨学研究领域，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非但没有能够得到解决，有时反而变得更加复杂，甚至连墨子本人的形象也成了一件捉摸不定的事情。

正是有鉴于此，在本书中，我希望能够本着客观的立场对墨学发展的历史作一个概观。自然，在墨学研究中，单是作一个概观就已经是一种不小的奢望了。章太炎早就说过，仅《墨经》的校勘和研究就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事业，而在过去的两百余年间，注墨和释墨的著作早已无虑百数，光是披阅一过就需耗费无数的时日。但古书的校理总是一个无限接近真实的过程，我们不可能寄望等到完全无误的那一天再来讨论其中的思想和内容。《墨子》一书同样如此，经过众多墨学家们的校释，我们实际上已经可以读懂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这对我们的论题来说已经足够了，只要不受个人好恶或其他实用的功利目的所操纵，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来重建思想史中的墨家形象。

按照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在本书中，我将分三编来讨论墨学演进的历史。上编主要讨论墨子。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如果有关墨子本人的情况不清楚，也就很难进一步弄明白墨家及墨学的真实面目。可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围绕墨子的争论恰恰最多，诸如姓名、里籍、年代、出